

锡伯营总管图伯特与藏传佛教

永莉娜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图伯特是锡伯族著名历史人物,清嘉庆年间曾任伊犁锡伯营总管、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前人研究图伯特,主要关注其政绩,本文从锡伯族与藏传佛教渊源;图伯特入藏与靖远寺兴建;图伯特与大喇嘛伊西模伦和伊犁将军松筠的关系三方面考察图伯特与锡伯营文化建设,特别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关键词:清朝;锡伯营;图伯特;藏传佛教;松筠;满文档案

中图分类号:K2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17)04—0027—07

乾隆年间,经过康雍以来长期努力,清政府终于将天山南北(新疆)纳入其管辖之下。战争后的西北广大地区,民生凋敝,土地荒芜,防务待强,鉴于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清统治者设立伊犁将军总揽天山南北事务,并调重兵驻防。在已经调派满洲、蒙古八旗兵丁情况下,清政府仍感兵力不足,遂经伊犁将军明瑞奏议,乾隆帝谕令从盛京(今沈阳)及所属诸城驻防锡伯兵中,挑选官兵1 020名,携眷调往新疆。

乾隆二十九年(1764),锡伯官兵自盛京启程,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到达伊犁,由于有亲属随行以及途中新生幼童等原因,抵达伊犁时的人数实际为5 050人^[1]。与锡伯兵在东北地区分别编入满洲、蒙古佐领方式不同,调入新疆的锡伯官兵被独立编营,安置在伊犁西北,并与察哈尔、厄鲁特、索伦三营呈环绕将军府之势。乾隆四十年,在锡伯营原六佐领基础上,增加两佐领,按八旗旗分编设八个佐领,营设领队大臣、总管、佐领等官,完善各级管理制度,锡伯营建制正式确立。

嘉庆四年(1799),图伯特(1755—1823)出任锡伯营总管^①。目前学界对图伯特的关注多集中在他主持修筑察布查尔大渠、改善锡伯营生存环境诸事,对他在锡伯营文化建设上的作为则罕有涉及。笔者不揣谫陋,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他与锡伯

营文化建设,特别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一、锡伯族与藏传佛教渊源

藏传佛教对锡伯人影响由来已久,至少可溯及西迁前时期。明末清初,锡伯人隶属科尔沁部蒙古。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将锡伯人由科尔沁部尽数“赎出”,编入满洲上三旗,设锡伯佐领74个,分别驻防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三城。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又将锡伯官兵尽数迁往盛京和京师(北京),拆分锡伯佐领并编入满洲、蒙古佐领。锡伯人最初接触藏传佛教,应在隶属科尔沁蒙古时期。约在天聪四年(1630),藏传佛教格鲁派内齐托音一世喇嘛^②自西向东,到科尔沁草原传教,受到广泛欢迎。藏传佛教在东蒙古各部发展迅速^[2]。《内齐托音一世传》明确提及锡伯人所受之影响:“八旗察哈尔等蒙古地区及盛京、索伦、卦尔察、锡伯等地,披红色袈裟者遍布,直达东海之滨,佛教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兴盛”^[3]。说明锡伯人与东蒙古诸部几乎同时皈依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在风靡东蒙古、锡伯诸部同时,且为满洲统治者所尊崇。天聪八年(1634),清太宗皇太极将林丹汗三宝之一的玛哈噶喇神像奉至盛京,崇德年间又于盛京敕建“七寺四塔”^③,这“七寺四塔”都是藏传佛教建筑。清朝入关前,盛京是清廷的藏传佛

收稿日期:2017-10-04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锡伯文(满文)基础语料库建设与研究”(15ZDB110)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永莉娜,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教中心。其后顺康雍乾诸朝,满洲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均推崇有加,或修建塔寺,或举办宗教活动,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各地锡伯人首先是盛京锡伯人深笃藏传佛教也就不足为奇。盛京太平寺,俗称锡伯家庙,就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作为锡伯军民进行宗教活动、维系民族情感的信仰中心,锡伯家庙存留至今,正是藏传佛教对锡伯族产生深远影响的实证。

同时,有了盛京锡伯人出家当喇嘛的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寄谕盛京将军恒禄不得强令锡伯喇嘛还俗,还说“嗣后,此辈愿为喇嘛者,亦不必禁止,听其自便”^[4];乾隆四十三年,清帝将盛京法轮寺改为满洲喇嘛寺,“挑选的‘满洲’喇嘛并不是满族人,而都是锡伯人”^[5]。以上事情虽发生在乾隆二十九年锡伯军民西迁以后,但时间相距很近,足以反映藏传佛教在锡伯民众中的深刻影响,以及清廷鼓励锡伯人信仰藏传佛教的态度。

二、图伯特入藏与靖远寺兴建

锡伯人西迁后,秉持藏传佛教信仰。锡伯营总管图伯特亲入藏地礼佛,复倡导兴建靖远寺,进一步推动了藏传佛教在锡伯营的传播。

(一)图伯特入藏礼佛

锡伯人西迁队伍中,就有数十名喇嘛随行^[6]。行抵新疆,成立锡伯营,复有藏传佛寺之设。据《锡伯族喇嘛寺事宜》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喇嘛寺,有喇嘛十名住寺唪经;四十六年,建佛殿,增加喇嘛人数,并报备有案,建四十三间房供喇嘛居住^{[7][410]}。说明寺庙已颇具规模,喇嘛人数有定,受到官府严格管理,并领取钱粮银。《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载有伊犁将军关于喇嘛经费预算奏报,如乾隆四十、四十三、四十四年所需兵饷经费银两细数清单,均记载“喇嘛估需钱粮银一千三百七十四钱零”^[8],均为锡伯营喇嘛由官方发给钱粮的佐证。

图伯特于嘉庆四年(1799)补放锡伯营总管。当时,锡伯营军民西迁已三十多年,人口日益增加,土地日益碱薄,原有耕地不能满足生产生活所需。为了锡伯营军民生存和发展,图伯特经过深思熟虑,倡议修渠引伊犁河水以扩大耕地。修渠毕竟费时费力,且锡伯营主要任务是驻防,加之有乾隆帝许诺驻防满六十年后返回东北原籍的说法广为流传^[9],故锡伯营中很多人反对修渠。图伯特坚持己见,向伊犁将军松筠请命,得到后者支持,修渠计划在嘉庆七年始施行。虽说得到官方允许,但修渠费用全部

由锡伯营自行承担^[10],且修渠人力在不影响驻防任务前提下,亦需锡伯营内部调剂。在这种情况下,图伯特主张合理安排施工,“春秋两季乘闲而动”^{[11][281]}“虽用工十万,于生计全无妨碍”^{[11][281]}。这种努力很快有了回报,修渠效果很快彰显出来,嘉庆八年即有渠水到处新得耕地分给佐领、骁骑校的记载^{[11][301]};嘉庆十年,据说新垦地上长出结二到五穗“吉祥大麦”,将军认为是“奇兆大吉”,命赏赐各旗(佐领)羊以祭庙^{[11][304]}。大渠持续修筑,至嘉庆十三年竣工。大渠的实效可谓立竿见影,时人徐松^④《西域水道记》赞曰:“既濬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12]关于图伯特对修渠所起重要作用,以及新渠对锡伯营乃至西北边疆农业开发的积极影响,前人多有叙述^[13],在此不赘。而笔者所关注的,则是嘉庆十一年三月,图伯特在大渠还未竣工情况下启程远赴西藏一事^{[11][304-305]}。

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为什么要远赴西藏?对此疑问,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探讨:首先是藏传佛教对图伯特个人的影响,图伯特这个名字,满文写作“tubet”^⑤。此发音及写法,在满文词汇里是“西藏”之意^⑥,该词在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发音,如蒙古文中的töbed^⑦,英文中的tibet,都是藏语读音在不同语言中的音转。图伯特在嘉庆元年补放副总管时已使用此名^⑧,说明并非其自西藏返回后所改。从中不难看出,藏传佛教对其父母家人有着深刻影响。图伯特生于盛京,在当地藏传佛教浓郁氛围影响下,其家族或本人信仰藏传佛教也顺理成章。据此看来,图伯特自伊犁远赴西藏的动机,很大程度应基于其本人及家族传统信仰。再者,图伯特作为锡伯营总管,在修渠未完之际即行赴藏之举,说明他前往西藏的动机并非只是基于个人信仰,而寓有更远大目标,即希望在锡伯营中进一步传布藏传佛教。此一推测,从其返回伊犁伊始即筹建靖远寺一事得以印证。

另一方面,图伯特此举可能得到伊犁将军松筠的赞同。图伯特作为一营总管,责任重大;而修渠又是一难度相当大的工程^{[14][267-272]},图伯特是工程的倡议者和总指挥,在大渠尚未竣工情况下,却要用较长时间离营赴藏,对此抉择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即便如此,松筠依然同意他赴藏。松筠是八旗蒙古旗人,信仰藏传佛教,在其意识里,旗人有此信仰,是永恒存在的道德规范^[15]。同样不应忽略的一点,就任伊犁将军前曾任驻藏办事大臣^⑨,因有此经历,而对藏传佛教顶礼膜拜,并成为他支持、鼓励锡伯营传布、

弘扬藏传佛教的思想根源,应是很自然的。

图伯特赴藏,随带锡伯兵、满洲兵各四^{[11]304}。作为锡伯营总管,他并非只带锡伯兵,满洲兵^⑩随行或有协助、监督之意,也许带有伊犁将军交付其他任务^⑪。图伯特在返途中买了十七岁和十一岁两名唐古特^⑫男孩,并记在名下^{[11]305}。图伯特有一子,时已成人^⑬,买两男孩,绝非承续家族香火,可能是希望将来培养做喇嘛。在锡伯营已有喇嘛的情况下,携两孩同回,显然与他们懂藏语有关。此行一共耗时一年七个月,途中两名满洲兵病故,其余六人随同返回^{[11]304}。图伯特一行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其间备尝的艰辛乃至种种磨难难以想见,而其信仰之笃诚亦因此行而彰显无遗。

(二)筹建靖远寺

嘉庆十二年(1807)十月,图伯特回到锡伯营,接总管关防^{[11]303},两个月后,于五牛录地方合力修建寺庙,落成房屋五十间,图伯特随即呈上于寺敕立称号和颁给大喇嘛伊西模伦札付的请求^{[7]410}。图伯特赴藏与兴建靖远寺两事前后紧密衔接,将两事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他远赴西藏寓有在锡伯营推广藏传佛教的深意。据此来看,此行很可能从西藏带回佛教经典、制度、礼仪。嘉庆十三年察布查尔大渠竣工,共得田七万八千七百零四亩,分给军民份地,其中总管得田四百亩^{[11]306}。这年四月,图伯特及全营官兵,合计捐给靖远寺香火地四百零四亩^{[7]410}。此举充分反映了靖远寺作为锡伯营官兵宗教活动和信仰中心,在他们心目中所享有的尊崇地位。香火地为靖远寺开展宗教活动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同时密切了锡伯信众与寺庙的关系,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同年十月,理藩院发给大喇嘛伊西模伦、格斯贵绰依扎木素、德木齐达尔扎等札付^⑭。札付内申明大喇嘛职责、严格对喇嘛班第的审查,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十四年正月,颁布住寺喇嘛在本旗户口册内仍列为闲散,免写喇嘛之命^{[7]411}。说明此时喇嘛身份仍未为闲散,并未将其特殊区分。笔者推测,这或者是为了保留喇嘛当披甲的可能性,避免因喇嘛身份在成为披甲时履行相关手续的麻烦。九月,请钦赐寺庙称号的奏报得到回复,清廷敕赐称号“靖远寺”。十一月,将钦赐寺名造匾悬挂,标志着靖远寺正式成立。

也是在这年十一月,图伯特奉旨赴京,觐见嘉庆帝^{[11]305}。随后,他奏准告假前往盛京,祭奠祖坟,立

碑勒铭。嘉庆十五年六月,图伯特返回途中晋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赏副都统衔^[16]。此后一段时间,有关靖远寺事宜仍归他管理^{[7]411}。同年十月,副总管德克济木布补放总管^⑮。翌年二月,图伯特到达塔尔巴哈台,接署理察哈尔-厄鲁特部领队大臣钤记^[17]。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图伯特卸任领队大臣回到伊犁^[18]。此前二月,靖远寺大喇嘛伊西模伦去世^{[7]412}。当时寺中已有大小喇嘛七十四名^{[7]412},是靖远寺历史记载中喇嘛人数最多的时期。

(三)图伯特身后的靖远寺

图伯特是锡伯营正蓝旗(七牛录)人,据说他退休后被正黄旗(二牛录)接去居住^[19]。道光三年(1823),图伯特去世。道光六年,对靖远寺加以修缮。十一年,寺中留喇嘛二十名,其余尽行返回原籍^{[7]412}。可知图伯特去世仅八年,寺中喇嘛已减至其在世时的三分之一以下。究其原因,嘉庆二十五至道光八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锡伯营作为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参与戡乱,官兵调派、阵亡等情况,可能影响到寺庙发展。此外,也可能与继任锡伯营总管的个人决策有关^⑯。道光二十年,锡伯营派人往乌里雅苏台章嘉呼图克图^⑰处取藏经,为请经献章嘉呼图克图纹银五十两,献香资纹银二百两^{[7]412}。说明此时寺庙事务又开始受到重视。咸丰六年,寺中有喇嘛四十名^{[7]413},较道光十一年增加一倍,但仍旧明显少于图伯特在世时期。

此后的靖远寺,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历经劫难。同治四年(1865),寺庙在战乱中遭到焚毁^{[7]413}。光绪十七年(1891),动工重建^{[7]413},继续保持藏传佛教寺庙功能,按照法令规范管理。在伊犁各寺院中,该寺藏经数量最多、种类最完整^[20],所组织的宗教活动仍得到上起将军下至普通军民的关注。

三、图伯特与大喇嘛伊西模伦

靖远寺第一任大喇嘛伊西模伦,除《锡伯族喇嘛寺事宜》对他略有提及,其他都是文学作品和传说。当然,这些传说和文学作品并非捕风捉影,而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故透过这些作品和传说,可以了解图伯特与大喇嘛的频繁交往与至交关系。

传说“伊西模伦不仅精通三世佛经,还以高超绝伦的医术在群众中赢得很高的声誉。他在伊犁河南北两岸为穷人看病,对疑难杂症也能妙手回春。据说伊犁将军患鼻疽,久治不愈,致使鼻孔腐烂。模长老实施开刀手术,获得成功”^[21]。医病传说是否真实,已不可考,但是如实反映了伊西模伦在民间享有

较高威望，并与将军有一定交往。理藩院札付中称：“伊犁锡伯营大喇嘛伊西模伦，尔有福焉，勤助寺庙事务……”^{[7]411}给予他激励并寄予期望。

这个精通医术，“在伊犁九城享有‘神人’盛名”^[22]的伊西模伦^①，是图伯特修渠的有力支持者。据锡伯族著名诗人管兴才^②所著长篇史诗《西迁之歌》中描述：“摩伦大喇嘛一片丹心，大义凛然力排众议：若要此事功告无成，愿同图公斩亲灭族，在所不惜！”^[23]正是这种赤诚，打动伊犁将军同意修渠大计。当时锡伯营主要任务是驻防，修渠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14]267-272}，一旦发生问题可能影响到锡伯营甚至伊犁地区的稳定。修渠由图伯特所始倡，其宦途在很大程度上也系于此。此时图伯特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尽管包括本营军民在内的很多人反对，他依然坚持己见。在这种情况下伊西模伦亦仗义执言，与图伯特一起向伊犁将军陈奏担保，“愿同图公斩亲灭族，在所不惜”。可见此人亦见识非凡、胆识过人。在此以前他与图伯特交情深浅无从得知，但经此一事的鼎力相助，与图伯特也算“生死之交”了。从此事件还可看出，在锡伯社会中，喇嘛是拥有较高政治地位的，一定程度参与本营事务，并产生重要影响。图伯特日后对宗教事务的积极支持，某种程度上也许受到伊西模伦的影响。如前述，图伯特生前，靖远寺喇嘛为数最多，也不是偶然的。

四、图伯特与松筠

考察图伯特与藏传佛教关系，不能忽略的另一点：他在总管任内所行修渠、赴藏、奏请钦赐靖远寺名号诸事，都是在松筠担任伊犁将军期间完成的。本身举驻防八旗一营之力修渠，已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从支持修渠足见松筠其人确有担当，后来又支持图伯特赴藏，归来后在锡伯营发展藏传佛教，亦可见其人励精图治心系边疆。关于二人关系，文献中甚少记载，只能通过对各种档案和时人笔记的勾稽，就松筠与图伯特在处理公务中的往来略作陈述。

嘉庆七年，锡伯委署佐领富勒亨额造册舛错，总管图伯特发现后报告领队大臣，松筠得知后奏报将相关人等交部议察。其中，关于对图伯特的处理意见，松筠奏称：“其该营总管图伯特，于未经领银之先自行查出，据实呈报，尚属留心，可否免议之处，出自圣思。”^{[24]498-499}嘉庆帝朱批：“图伯特著宽免。余交该部分别察议。”^{[24]499}嘉庆十年，松筠奏请将图伯特和

惠远城协领扬桑阿送部引见时称：“总管图伯特现年五十一岁，果断殷勤。各自在任内尽力奋勉，技艺均可，堪以皇上选用。”^③此奏请引见时间早于图伯特往西藏的嘉庆十一年，更早于大渠竣工的嘉庆十三年，说明图伯特倡始修渠并已初步成效一事已得到松筠充分认可。道光十年锡伯营总管和特恒额等铭刻图公(图伯特)碑文记载：“功德奏报将军，将军俱奏皇上，恭奉御批‘知道了’，记录在档。”^{[11]285}

由上可见，图伯特的才能和责任感得到将军松筠的充分认可，换言之，松筠也是助成图伯特修渠和发展藏传佛教事业的重要人物。松筠乾隆十九年出生，图伯特乾隆二十年出生，堪称同龄，且同在清政府大力开拓疆土和治理边疆的背景下任事。松筠常年任职于边疆，图伯特更是九岁即从盛京迁徙新疆，他们都是清政府治边战略的身体力行者。如何使边疆长治久安，无疑是他们肩负的共同使命。在使命感召下，松筠和图伯特虽为上下级关系，但是都能充分支持和理解对方的想法，并在各自职位上作出显著成绩。

图伯特经松筠推荐，遵旨引见，并得到嘉庆帝认可，不仅准其回盛京省亲，返回途中还诏授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领副都统职衔，成为锡伯营出任领队大臣第一人。及图伯特卸任领队大臣，将军长龄专折奏报此事，并称若锡伯营总管出缺，将另行请旨由其复任，嘉庆帝并未表示异议^④。由此可见，嘉庆帝对图伯特亦信任有加。

五、结束语

图伯特不仅重视锡伯营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他倡议、带领锡伯营军民筑成察布查尔大渠，扩大耕地，极大改善了锡伯军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重视文化建设，他信仰藏传佛教，远赴西藏唪经礼佛，在锡伯营积极传播藏传佛教，倡建靖远寺。其所作所为，得到大喇嘛伊西模伦、伊犁将军松筠的支持，并对锡伯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满文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4页；汉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60页。

②内齐托音一世(1557—1653)，在东蒙地区传教多年，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喇嘛。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

辑·内齐托音一世传》，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③七寺是：实胜寺、玛哈噶喇佛楼（又称玛哈噶喇庙）、长宁寺（又称御花园）、永光寺、延寿寺、广慈寺、法轮寺。四塔是：距沈阳故宫太庙五华里的四个方位建了东、西、南、北四座塔。其中永光寺、延寿寺、广慈寺、法轮寺为四塔的塔寺。

④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历史地理学家。嘉庆十三年以进士任翰林院编修，道光年间任礼部主事、江西道监察御史等。嘉庆十五年被流放至新疆，撰写《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参与编写《新疆识略》等。参见赵佩生《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载《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⑤档案满文件里图伯特满文名写作“tubet”，本文满文转写使用穆林德夫转写法。参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二三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⑥[名]<地>土伯特（又作图伯特，清初文献中对西藏地区的称呼，为“吐蕃”的别译。清康熙二年始改称西藏）。见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3页。

⑦[名]①西藏，西藏人，藏族。②<史>吐蕃。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写《蒙汉词典》（增订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7页。

⑧满文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1页；汉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57页。

⑨乾隆五十九年，松筠担任驻藏办事大臣，嘉庆四年卸任。参见牛小燕《论治边名臣松筠》，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85—86页。

⑩伊犁驻防八旗中可称满洲兵的，是满营军士，满营驻惠远城保卫将军府，所以这里的满洲兵很可能是惠远城或者将军府里的军士。

⑪图伯特在西藏的具体言行，很遗憾笔者暂未能发现其记载。

⑫参见永志坚、英林《图伯特纪念文及史料译释》，载永志坚主编《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满文tanggūt，[名]唐古特，清初官方文书中称青藏地区及

该地区的藏族，参见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6页。这里反映了图伯特返回的路线，可能是经由青海返回的。

⑬其子名曰富呢扬阿，嘉庆二十一年时三十四岁，则嘉庆十二年时是二十五岁的成年男子。参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二三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⑭参见管兴才译《锡伯族喇嘛寺事宜内所载事由摘要译件》，载贺灵、佟克力辑注《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0页。大喇嘛，即首领喇嘛，是寺院负总责的主事喇嘛；格斯贵，主要负责寺院经会，处理违反寺规者；德木齐，负责寺庙收入支出等财政事务。以上职责参见胡方艳《伊犁河谷藏传佛教寺院考察——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圣祐寺为中心》，载《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4期。

⑮满文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3页；汉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66页。

⑯嘉庆十九年二月至道光八年十月，锡伯营总管是额尔古伦，在其任下修补了寺庙；道光八年十一月至道光二十年三月，总管是和特恒额，其任下靖远寺喇嘛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道光二十年四月至道光二十四年五月，总管是德克精阿，道光二十年八月锡伯营派了人去乌里雅苏台请藏经。因此笔者认为靖远寺人数变化可能与总管有关。以上总管任职时间满文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485页；汉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70—375页。

⑰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清代蒙古地区最有影响的两大活佛系统，前者成为内蒙古乃至京城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和喇嘛的领军人物，后者成为不同时期外札萨克喀尔喀地区的宗教领袖。参见胡日查《清代蒙古寺庙管理体制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22页。

⑱伊西模伦是锡伯营正红旗（四牛录）人。参见余吐肯《论图伯特的历史贡献》，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⑯管兴才(1894—1963),锡伯族著名诗人,锡伯营正红旗人,精通锡满汉蒙藏文,会说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解放前曾任锡伯营总管档房笔帖式,察哈尔营右翼领队大臣诺罗的笔帖式,伊犁镇守使参谋处秘书,昭苏县政府秘书。伊犁镇守使副都统牛时和堪布大喇嘛曾请管兴才先生给庙宇大厅匾上题字,现昭苏喇嘛庙上的满汉蒙文便是管先生墨迹,因精通蒙藏文,喇嘛们请他讲佛经,于是“管巴克什”尊称传遍昭苏草原;解放后,管老先生在察布查尔县任区政府秘书,后调到县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退休后病故。创作、翻译作品多部,史诗《西迁之歌》是其根据史料和传说用锡伯文于1948年草创,1981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以上介绍参见余吐肯《锡伯族诗人管兴才与西迁之歌》,载《满族研究》,1989年第2期。

⑰汉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513页;满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0页。

⑱满文参见《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二三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引用处系笔者之翻译理解。

参考文献:

- [1]吴元丰,赵志强.清代伊犁锡伯营综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1).
- [2]王佳.内齐托音与黑龙江藏传佛教[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2).
-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内齐托音一世传[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148—149.
-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九册[A].长沙:岳麓书社,2011:612.
- [5]赵志强.北塔法轮寺与蒙古族满族锡伯族关系述论[J].满族研究,1991(3).
- [6]肖夫,译.部分《锡伯营总管档房事宜》[M]//贺灵,佟克力,辑注.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254.
- [7]管兴才,译.锡伯族喇嘛寺事宜内所载事由摘要译件[M]//贺灵,佟克力,辑注.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 [8]贺灵,佟克力,辑注.锡伯族古籍资料辑注

[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86—90.

[9]余吐肯.论图伯特的历史贡献[G]//永志坚,主编.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81.

[10]永志坚.锡伯营滋生银小议[G]//永志坚,主编.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74.

[11]永志坚,英林.图伯特纪念文及史料译释[G]//永志坚,主编.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12]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西域三种[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296.

[13]吴元丰,赵志强.清代锡伯族对祖国的贡献[J].民族研究,1989(2);余吐肯.论图伯特的历史贡献[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吴元丰,赵志强.历史铭记你——赞察布查尔大渠[G]//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267—272.

[14]吴元丰,赵志强.历史铭记你——赞察布查尔大渠[G]//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15]村上信明.清朝中期における蒙古旗人の自己認識—正藍旗蒙古旗人松筠の例を中心に-[J].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005(20).

[16]清实录:第三一册[M].仁宗实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9.

[17]《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二二七册[A].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48.

[18]《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二三六册[A].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0.

[19]永志坚.图伯特姓氏与旗籍考——兼评“图公生祠”之说[G]//永志坚,主编.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二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162.

[20]英林.靖远寺琐记(系列五篇)[M]//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史资料:第二辑,2005:166.

[21]胡方艳.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宗教信仰历史与现状考察之一——锡伯族的藏传佛教信仰[J].宗教学研究,2010(3).

[22]余吐肯.论图伯特的历史贡献[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

- [23]管兴才,作. 西迁之歌[M]. 余吐肯,译//关学宝,主编. 锡伯族民歌集.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
-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 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A].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何苗苗】

Xibo Camp Director Tubote and Tibetan Buddhism

YONG Li-na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China)

Abstract: Tubote was a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 of Xibo Nationality, once served as Xibo Camp director in Yili and Tarbagatai commandant during Jiaqi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 Previous studies of Tubote, mainly concerned about hi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is relationship with Tibetan Buddhism. There are three main points: 1.The historical origins between Xibo Nationality and Tibetan Buddhism; 2.Tubote's entry into Tibe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Jingyuan Temple; 3. His relationship with Yiximolun, the Da Lama of Jingyuan Temple,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Yili General Songyu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Xibo Camp; Tubote; Tibetan Buddhism; Songyun; Manchu Document